

# 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与中国逻辑

——对五四运动以来百年历史的现代性审思

任 平 郭一丁

**内容提要** 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以唯物史观深望伟大的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历史及期间开创的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具有重大意义。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即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包括中国新现代性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之“新”在于以中国方案深刻解答了“马克思之问”和“列宁之问”,它不是套用西方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经典现代性道路的模板,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经典现代性道路的翻版,更不是鸦片战争以来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再版,而是形成了鲜明的新现代性方案,在新世界历史场域中创造着人类新文明道路,其内蕴的中国逻辑书写着中国化的唯物史观。

**关键词** 唯物史观 新现代性 中国道路 中国逻辑

任 平,苏州大学教授 215123

郭一丁,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215123

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已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今天,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历史方位上,以唯物史观回望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历史,它不仅表现为现代性启蒙意义上的文化觉醒史,而且是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开创史,更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史。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即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包括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之“新”在于以中国方案深刻解答了“马克思之问”和“列宁之问”,它不是套用西方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经典现代性道路的模板,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经典现代性道路的翻版,更不是鸦片战争以来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再版,而是形成了鲜明的新现代性方案,在新的世界历史场域中创造着人类新文明道路,其内蕴的中国逻辑书写着中国化的唯物史观。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研究”(12&ZD108)中期成果。

## 一、超越资本逻辑规制的新现代性道路：“马克思之问”的中国解答

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开辟,是五四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的最伟大成果,是对“马克思之问”的中国解答。现代性意义上的“马克思之问”是指:是否存在超越资本逻辑主导(规制)的现代性进程?如果加以展开,这涉及一个问题系:第一,是否所有的现代性逻辑都是资本逻辑?第二,是否存在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可选择的现代性进程?第三,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是否需要到资本逻辑的再利用?这涉及资本逻辑与现代性逻辑之间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答贯穿着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出场史。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明确地提出关于“现代性”的概念,但是,他却对资本逻辑条件下的“资本现代性”意义上的存在体“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生产”“现代无产阶级”和“现代资产阶级”等等做过最为深刻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列宁在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关于“现代社会”概念时,曾在著名的《哲学笔记》中这样反问:“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sup>[1]</sup>“列宁之问”尖锐地触及一个事实:尽管在西方长期遭遇种种遮蔽,但是这并不能掩盖马克思作为现代性思想家的光芒。“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社会理论家。”<sup>[2]</sup>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基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完整的社会概念,而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经济或文化片层的在场。现代性就是对现代社会本质属性的概括。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的生成或获得过程。然而,“现代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就构成“马克思之问”的基本内容。

长期以来,学界,包括笔者在内,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现代性考察及其现代性思想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普遍认为,马克思在现代生产意义上对资本现代性逻辑开展了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将资本逻辑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本质、核心和决定性因素<sup>[3]</sup>,换言之,“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sup>[4]</sup>。我们可以将这一关联称为“资本逻辑规制(主导)的经典现代性”。这一经典规制,在马克思《资本论》中,表现为西欧的“历史必然性”:<sup>[5]</sup>“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sup>[6]</sup>教条主义者由此将现代性逻辑解释成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性单线论,曲解为一种被晚年马克思怒斥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这一历史哲学所展现的唯物史观,就是基于西欧“历史必然性”的唯物史观,也就是对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的历史必然性的哲学表达,而后被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圭臬。当代西方学者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站在这一逻辑起点上都认为现代性毫无疑问是一项西方工程。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将资本逻辑与现代性逻辑完全画等号,或者将现代社会完全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更没有将仅限于西欧的结论无条件地扩展至全球,而是辩证地、历史地看待现代性社会逻辑与资本逻辑关系,看待西欧和东方的异同。在马克思看来,虽然当时的现代性社会是由资本逻辑造就的,但是现代性进程并不完全等同于资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的现

[1]《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2]〔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3]参见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4]〔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

代性社会逻辑必然是存在的。资本逻辑仅仅是现代性逻辑的一种历史形式或社会形式。哈贝马斯曾经提出,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一直是不言而喻的,今天却成了问题”<sup>[1]</sup>。究其根源,资本逻辑的现代性社会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而必然灭亡,必然被后资本社会的现代性所取代。这一深刻的社会矛盾表现在:一是基于资本逻辑的现代性社会造就人与人的全面异化和阶级对抗,使人类的社会关系全面崩溃,这一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二是基于资本逻辑的现代性社会造就人与自然的全面分离和对立,使人类存在的自然条件不断崩溃,因而使人类发展不可持续;三是造就了全球分裂和世界对抗,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同样不可持续,因此必然要灭亡。资本逻辑的覆灭并不代表其造就的一切现代性文明成果同步毁灭,相反,是强加在现代性社会逻辑身上的不合理社会关系的消除和现代性逻辑的解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启蒙以来现代性意识形态进行无情批判的基础上,对于基于全面生产(现代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人口生产、社会关系生产以及精神生产等等)的现代性社会做了十分惊人而独特的阐释,此阐释一直延伸到对后资本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现代性特征的描述(打破地域封闭的共产主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交往扩大的特征、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等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用辩证的历史二分法来看待资本逻辑的历史存在,一方面对资本逻辑造就的现代性文明进程(涉及前人无可比拟的生产力、仿佛用魔法召唤出来的大量人口、深刻变革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等等),做了深刻描述,被德里达称为“对资本的最高褒奖”。这一褒奖的基本内容,就是现代性进程。另一方面,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现代性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由此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sup>[2]</sup>著名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资产阶级的灭亡绝不是现代性文明社会成果消失,社会主义所改变的仅仅是其现代性成果的社会关系性质。在后资本逻辑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变革的仅仅是资本逻辑宰制现代性逻辑的狭隘的社会关系及其意识形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3]</sup>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既全面肯定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在分析资本逻辑展开的每一章,马克思几乎都仔细阐释了资本推动文明进步、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现代性逻辑。但是,马克思还更深入地剖析了资本现代性的矛盾体系,指明其必然面临“剥夺者被剥夺”“丧钟敲响”“外壳炸毁”的覆灭命运。在一场世界革命之后,对资本逻辑束缚的摆脱将是现代性逻辑的解放,社会主义将在承接现代性逻辑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更高起点上继续发展现代性逻辑,因此前景将更加美好。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将巴黎公社看作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在一切方面体现着劳动解放的现代性特征,从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自治公社到国民军、教师、国民代表的出现等等。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开创了现代性社会,但绝不是现代性逻辑的唯一结果。

一直到《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逻辑与资本逻辑关系的复调叙事始终是作为隐性逻辑而存在的。现代性逻辑源于和基于资本逻辑的历史必然性,这是马克思所指称的“仅限于西欧的结论”。然而,1881年,马克思接到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的查苏利奇的来信,信中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直接使现代性逻辑与资本逻辑关系问题显性化。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为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作的序中将这一矛盾表述为:“俄国公社……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

[1][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第422页。

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sup>[1]</sup>“瓦解过程逻辑”就是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西欧的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就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直接过渡”逻辑却是指示一种异于西欧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性逻辑。对这一尖锐问题的回答则意味着马克思必须对是否承认存在一种与西欧“历史必然性”不同的东方道路,即不同于资本逻辑现代性经典规制的现代性逻辑问题,做出选择。这不能不引起马克思的深思,马克思为回信几易其稿,足见其踌躇。马克思在回信手稿中指出,俄国历史残留的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形式提供了“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置于正常条件下,那它就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sup>[2]</sup>。在正式回信中,马克思并没有提“不通过卡夫丁峡谷”,而是谨慎地指出:“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sup>[3]</sup>“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够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sup>[4]</sup>“但是一个遗留的问题在于:作为社会新生的支点,农村公社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样的非资本逻辑的“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实现现代性?“马克思之问”由此展开:第一,究竟是否存在一种不通过资本逻辑主导而展开的现代性逻辑?第二,如果存在,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进程?它是否需要资本逻辑的再利用?

第一次给予“马克思之问”以实践解答的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列宁正式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使命,一百年前由他领导发动的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活生生的制度性现实,而且在于在批判考茨基教条主义基础上思想解放地提出了一个创新思想:未完成现代化的落后国家,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用苏维埃政权力量开辟出一条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经典规制的另一种现代性之路,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同时,需要对资本逻辑进行再利用,获取一切通过资本逻辑而获得的现代性文明成果,并且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力量。于是有了列宁提出的两个著名的社会主义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sup>[5]</sup>及“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sup>[6]</sup>。但是,深刻的问题却由此展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究竟建设一个怎样的现代性社会,以及如何建成这一社会?这就是“列宁之问”的实质。

回顾中国对西欧资本逻辑现代性规制的超越历史,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更加特殊的国情中解答“马克思之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极探索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目标,这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备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之苦的中国人民,不可能再接受一个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方案。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不可能再重蹈旧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覆辙,而只能是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新现代性道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性历史表明:只有走新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无论是照搬西方现代性套路的清朝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9页,第37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7页,第840页。

[5][6]《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第364页。



封建贵族改良运动,还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或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之所以全部失败,没能完成中国现代化伟业,不仅因为领导阶级本身的局限性,而且因为其对现代性、现代化的理解即现代观是落后的。一个既缺乏科学的现代观指导、又受本阶级狭隘利益局限的阶级,是不能拯救中国危难、完成现代化民族大业的。历史同样表明,不能像陈独秀、王明那样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西方社会现代分期的理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性思想中国化,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才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性大业。

## 二、超越近代经典现代性的中国新现代性道路:五四运动百年来的历史逻辑

鸦片战争以来近180年,就是现代性中国道路的历史。以五四运动为分界,之前近80年可称为经典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历史,之后的100年可称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历史。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又分为新现代性的革命道路和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而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伟大的五四运动是超越资本逻辑规制的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百年的历史逻辑,就是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所承载的中国逻辑。

从前现代社会转向现代性社会的进程必须经历伟大的社会变革。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在追求现代性的意义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中国所追求的现代性道路正是全球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道路(经历了从学“坚船利炮”的优势技术到师法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制度和文化的过程),经典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学徒”总是被“先生”欺凌。这一现代性进程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之所以屡战屡败,根本原因有三。一是全球资本霸权的压制。通过资本逻辑规制走上经典现代性道路的西方列强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经过了长期、大规模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掠夺,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动了无数次战争侵略。中国深受其害,遭受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丧权辱国,沦为依附西方的半殖民地。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sup>[1]</sup>。正是在备受西方列强侵略压迫而久经磨难却又持续奋起抗争的历程中,中国人民对资本现代性的西方道路的根本弊端和危害才有最深刻的记忆和认知,从而才坚定不移、独立自主地开辟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超越资本现代性的西方道路模版、走民族独立的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是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阶段并进入新时代才真正得以实现的。二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的联手压制,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承担起领导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三是时代条件的根本变化,使封建贵族改良的现代性之路、农民造反的现代性之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典现代性之路,全部破产。在奋起反抗资本现代性的西方列强侵略剥削、寻找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以复兴中华的历史征程中,有若干在历史出场又退场的匆匆过客,他们的现代性立场、主张和奋斗的最后失败结局留给我们太多的经验教训和深刻启迪。

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伟大开端,原因也有三。一是文化觉醒成为社会现代性的先导。正如西方启蒙的文化现代性成为社会现代性的伟大先导一样,五四运动中思想文化的大传播成为新现代性的文化先导,而文化传播和文化觉醒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习近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2012年11月30日, <http://cpc.people.com.cn/2012/1130/c64094-19746089.html>。

进程,由此,“五四”以来的百年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主导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这成为在思想文化上造就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先决条件。以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认识中国现代性的规律,建立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化唯物史观,这使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开辟奠定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之下,因而使之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二是无产阶级独立登上历史舞台,接受马克思主义引领,继而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无产阶级成为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自觉的认知主体、实践主体和领导力量,标志着现代性主导阶级的历史性转变。由此,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三是俄国十月革命深刻改变了资本全球化的格局,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革命和现代性运动变成了世界反资本霸权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有机构成。五四运动恰好是中国与这一世界格局第一次伟大对接的表现。

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性道路究竟该如何选择?主张继续走西方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之路的,不仅有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前途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教条主义者,如陈独秀、王明等人。他们援用西方现代性逻辑分期框架来剪裁中国实际,认为民主革命依然应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最终前途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因而无产阶级不应该与之争夺领导权。这一教条主义最终葬送了大革命。在深刻总结实践教训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逻辑”。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对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科学命名,而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现代性逻辑上的必要归类。这一现代性革命之所以“新”,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主要在于以下三点:一是现代性主导力量发生根本转变,从封建新贵、农民和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手中。主导力量的转变,决定了现代性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方向从经典现代性道路向新现代性的变化。二是现代性革命的主客观对象发生了根本改变,革命对象不再单纯是本国的封建主义,而是包括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也就是说,资本逻辑规制造就的经典现代性的全球霸权和本国大资本也在革命对象之列,这是新现代性革命根本不同于经典现代性革命的新特点。而革命主体力量则不再是封建新贵、单纯的资产阶级或农民阶级,而是由工人阶级领导,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大众。三是现代性的性质和前途发生了根本转变。革命目标不在于仅仅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在落后的中国走新现代性道路,无论是革命还是发展,民族资本都是积极力量,不仅要获取资本创造的一切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而且依然要利用好、发挥好资本逻辑推动现代性进程的积极作用,但是要限制其消极作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之问”的创新性的解答。由此,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历史必然性”道路的中国历史必然性道路,从而为催生中国化的唯物史观的出场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

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创建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从而为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而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是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在发展阶段的继续。两者是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不可分割、前后衔接的两个阶段。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史,其本质规定正是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逻辑。

### 三、超越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道路:解答“列宁之问”的新现代性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同样也是现代性的中国化产物。科学社会主

义中国化逻辑与现代性的中国化逻辑的对接,才构成在现代性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这就是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

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是在既超越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也超越苏联经典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出场的。前者我们已经做了阐释,后者需要再做些说明。如前所叙,列宁根据资本现代性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形势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认为在作为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一国实现率先突破革命瓶颈是可能的,而同步世界革命恰好是不可能的。革命胜利后红色政权能否持续,关键在于能否发展综合国力、完成现代性。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辟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现代性道路。苏联根据列宁的思想,在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探索,迅速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站在世界前列的工业大国,成功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然而,苏联不仅在社会主义模式上变得僵化,更在现代性思想和实践上偏向技术主义,而全然忘却“列宁之问”对“现代社会”的反思,表现为一种将现代性单纯归结为技术进步而在社会主义模式上僵化教条的经典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其实,现代性本质上是对现代社会性质的抽象,无论在资本逻辑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都包括现代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和文明的全面进步。因而,在世界急剧发生的后现代和新科技革命巨大变化面前,苏联却日益陷入了僵化境地,而继起的改革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导致东欧剧变。因此,认真总结苏联经典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大地上开创新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苏联的经典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模式对新中国有莫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迫切要求带领中国人民用现代化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局面,但是另一方面则在“什么是现代性、怎样发展现代性”的问题上缺乏经验,只能“一边倒”地学习苏联模式。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里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sup>[1]</sup>次年3月,他深情地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sup>[2]</sup>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sup>[3]</sup>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相适应,毛泽东还提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sup>[4]</sup>。他还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sup>[5]</sup>所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在审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提出较为系统的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sup>[6]</sup>这一论述,一方面确立了走现代性之路、建设现代性强国之路的决心,另一方面,对现代性的理解依然限于物质技术层面,沿着苏联的经典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之路前行。

历史证明:苏联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究竟什么是现代性以及如何实现现代性”这一“列宁之问”的片面解答,即其选择的技术现代性和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进一步加深了现代性矛盾,使苏联和中

[1][2]《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第395页。

[3][4][5][6]《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第71页,第126页,第341页。

国付出了巨大代价。全面改革、对外开放是超越这一道路模式、开辟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关键性历史抉择。在回望中国走过的路并与别国比较的基础上,邓小平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sup>[1]</sup>他同时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sup>[2]</sup>。“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阐发表明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完整命题的提出,它包括中国新现代性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概括地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sup>[3]</sup>中国用决定前途命运的全面改革关键一招,全面破除苏联留下的一整套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体制机制模式,超越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新现代性强国目标,才真正走出了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道路。“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sup>[4]</sup>“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罕见之大变局,无论就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中国道路过程中制度、理论和文化所造就的社会变革的深刻程度,还是就其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飞跃而言,其被称为“伟大革命”都是当之无愧的。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新现代性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举措,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举措。正是改革开放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真正使中国摆脱苏联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僵化模式,走出一条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性道路。

#### 四、中国新现代性道路:本质向度与总体纲领

在本质性向度上,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或曰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究竟指什么呢?或者说,“新”在何处呢?

第一,在超越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道路的意义,中国新现代性道路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新”。一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导的以人民为宗旨、人民为中心、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新现代性道路来超越和替代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的那种人与人的全面异化和阶级对抗的进程;二是以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来超越和替代资本逻辑规制下人与自然全面对立、自然生态环境全面崩溃的经典现代性道路;三是以倡导共享发展、合作共赢、全球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来替代资本逻辑的全球分裂、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当然,中国的新现代性道路不是全面否弃资本,而是在充分发挥资本推动现代性文明进步作用的同时,对其消极导向和另类牵引进行积极压制、消解和应对。因此,中国新现代性发展道路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第162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4]《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2/18/c\\_1123868586.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2/18/c_1123868586.htm)。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关切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把不断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推动现代性全面发展的主要杠杆,把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推动现代性的主要动力。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党的领导,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这成为富民强国的新现代性中国道路根本区别于资本现代性道路的显著标志。

第二,在超越和替代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典现代性的意义上,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之“新”同样在于以下三点。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通过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新现代性的中国革命道路;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上开创的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经典现代性道路;三是在全面跨越的基础上,实现了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逻辑与现代性的中国逻辑的统一。

第三,在超越苏联的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之“新”在于:一是破除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现代性理解的“技术教条”,将现代性领域扩展到了整个社会,扩展到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倡导“全面改革”“五位一体”,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完整的现代性目标,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目标和过程的内涵;二是实现了将现代性逻辑自身的丰富内涵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有机结合;三是破除了僵化教条的社会主义模式,通过全面改革开放,开创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超越了苏联的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在伟大创新实践中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压倒性优势。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正紧紧把握现代性逻辑内在出现的“时空压缩”甚至“时空倒置”机遇,充分利用全球化世界普遍交往条件,与此同时,新时代的中国新现代性道路不是跟在西方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性和欧洲新现代性身后亦步亦趋,而是在多元现代性道路要素中重新选编现代性程序,着力将多次现代性任务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合一进行,这表现为一系列的“新”或“新型”现代性,如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市场化、新型民主化、新型大国外交关系、新发展理念等,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从严治党新要求等。这些“新”,共同构成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总体特征和全面纲领,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提供了经典样本<sup>[1]</sup>。

具体来说,新型工业化,就是时空压缩地将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再工业化等合为一个现代化过程。工业化一直被世界各国当作现代性的标志之一。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但是依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任务。然而,新现代性又提出了信息化、智能化的新标杆。中国既不能亦步亦趋地先完成工业化再完成信息化、智能化,也不能走西方某些大国仅仅做信息化、智能化而忽视工业制造、造成“产业空洞化”的路子,而只能走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智能化带动和提升工业化进程,推动“互联网+”、智能制造,推进“中国制造2025”,从而立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产业创新的潮头。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大力推动从追求高速度向追求高质量、高效益经济转变,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新型城镇化,就是中国不跟着西方在城市化道路上来回摇摆,而是坚定地走“城镇化为民”“产城融合”和绿色发展的新路。西方资本现代性在经典现代性阶段主张城市化而推动“羊吃人”的圈地运

[1]参见任平:《论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读》,〔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1期。

动,发展工业,消灭农民和农村。西方国家在后现代阶段出现“逆城市化”。资本家大量逃离城市中心而奔赴乡村和郊区,出现了所谓“大郊区”。欧洲在新现代性阶段又出现了回摆效应,即“再城市化”。富人重新改造城市街区,将穷人再次赶到城市边缘,城市再次成为富人居住、生活的天堂。空间生产成为资本逐利的主要手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起因就是资本炒房的危机。西方城市化是为资本化的富人服务的。中国新型城镇化根据产业转移和数亿农民迁居城市的巨大使命,秉承为民宗旨、绿色宗旨、协调宗旨,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网络化体系来回应全体人民对空间居住美好生活的诉求,因而既要使得城市居民公平正当地获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要考虑城乡一体、城乡统筹发展,高度体现了中国新现代性特点。

新型市场化,就是吸取西方资本现代性的放任市场失灵、宏观国家干预失灵等等教训,既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发挥好政府在引导和再分配中的作用;既强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又重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作用;既重视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作用,又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明确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使命。这是现代性总体格局中的经济板块。

新型民主化,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报告的论述深刻、充分。需要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所必然指向的,体现在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三位一体作为政治现代性的总框架,在全力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选举权、监督权、参政议政权的同时,大力发展能够让人民更多参与民主全过程的协商民主。这把民主的直接形式与代议制民主间接形式结合了起来。

新发展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之归结为“十四个坚持”的基本内容之一,从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战略。“五大新发展理念”之新,在于它根据当代中国发展实践和问题而提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更在于它引领了世界最新现代性发展潮流。

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大国关系,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推动人类持久和平发展的关系。正是这一方向,充分体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独特创新和魅力。

新型的政党现代性,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事业的领导核心,不仅用先进的现代性思想指引中国,更要自觉地将党的全面领导和组织行动纳入法治化轨道,从严治党。后发国家现代性道路从来都是依靠现代性政党的领导来完成的。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唯一执政党,党自身若出现差池,可能使中国的现代性事业毁于一旦。没有一个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党,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成功。因此,必须从严治党。从严治党要考虑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法治化、治理规范性,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的建设、党内文化建设、反腐败、干部素质和能力建设等各个方面来全面推进治本方略,这是中国现代性伟业成功的最核心、最关键的环节。

## 五、中国化唯物史观:新现代性的中国逻辑的哲学表达

开辟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是我们这一伟大时代最伟大的事件。站在伟大时代的制高点上回望

和前瞻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我们需要有把握伟大时代的真正哲学。只有用中国化唯物史观,才能真正穿透这一道路独特的本质向度,才能把握其所蕴涵的内在逻辑,才能充分揭示其开创人类新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在考察多元的现代性的民族道路问题上,我们不能用马克思所说的“仅限于西欧的结论”跨界平移于中国,不能简单用深描西欧“历史必然性”的唯物史观照搬照抄地阐释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而必须将唯物史观中国化。中国新现代性实践所开辟的人类新文明道路,同样需要用中国化的唯物史观才能真正说明。

中国化唯物史观的出场根据更在于它是时代的问答逻辑。对中国新现代性道路五个重大问题的解答,必然原创中国特色、中国话语的唯物史观理论。

第一,在现代性遭遇世界历史复杂语境中科学判断中国现代性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开辟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第一个追问必然指向是:“为何”与“可能”,因为现代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历史复杂语境。一是原初西方资本逻辑规制的经典现代性内生的根本弊端和矛盾,早被黑格尔用辩证法做了深刻剖析,并进而遭遇马克思的全面深刻的批判;二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核危机、生态危机、发展危机、地域不平等、金融危机等等招致拉美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和新现代等各方面思想家的深刻批判。特别是丹尼尔·贝尔、福柯、哈桑、利奥塔、德里达、阿伦特、罗蒂等一大批后现代学者对启蒙以来的现代性文化和社会进程的弊端和矛盾做了激烈的批判,使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弊端暴露无遗。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性的实践也不断呈现种种矛盾和问题,未获现代化,已得现代病,如生态环境问题、城市问题、社会分层问题等等。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一向不言而喻的现代性的合理性,现在成为一个问题。在总体上,中国化唯物史观必须审时度势,科学判断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可能走向:究竟中国能否照搬西方现代性的套路,沿着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新现代等等道路亦步亦趋,或者说按照后现代思潮指引的跨越“现代性陷阱”走后现代之路?又能否照搬哈贝马斯、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等人的“自反的现代性”即欧洲新现代性模式?毫无疑问,中国化唯物史观必须批判“历史单线论”的现代性道路观,在多元现代性道路视域中承认和拓展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可能性空间;必须批判那种超越民族国家现实语境的教条的“一般历史哲学”,揭示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新现代性道路的必然性;必须批判后现代“历史必然性虚无主义”的碎片化主张,坚持中国新现代性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根据。一个判定和解答是: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必须坚定走中国新现代性之路。这既不是西方经典现代性,不是后现代,也不是欧洲新现代之路,而是沿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奠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了的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走下去。这既是我们的历史逻辑决定的,也是我们的实践逻辑决定的,更是今天的中国逻辑决定的。因而,中国化唯物史观由此而形成的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和必然性理论,就是我们的理论自信之源。

第二,充分阐释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内生的中国逻辑,准确预测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历程。中国化唯物史观必须阐明中国新现代性的逻辑,包括新现代性的革命逻辑和发展逻辑,它自身因而成为这一逻辑的哲学表达。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准确阐释了新现代性的中国逻辑,其中包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革命目标和过程。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以及“三步走”的战略,党的十九大关于中国新现代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目标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三步走”的战略,都无比清晰地刻画了这一新现代性的中国发展逻辑,并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实践逻辑提供了鲜明的思想指引,因而创制了中国化唯物史观关于中国新现代性发展的目标论和阶段论。

第三,深刻阐明了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价值旨归与力量基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是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中国现代性的价值追求不再是任由资本逐利及其利益最大化,而是一切发展努力为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成为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内在的主旨;中国现代性的实现力量的基点不再是资本逻辑的玩弄操控,而是一切发展依靠人民。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发展而从事新现代性的事业,成为开辟新现代性道路的历史主体,新现代性道路则是中国人民走向强大未来的存在方式。

第四,深刻阐明新现代性道路所必然存在的内在矛盾和矛盾的解决方式。既要利用资本逻辑,又要限制资本弊端,这种“与狼共舞”本身就是矛盾,因为异化和扬弃异化两者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把握对资本分析的历史辩证法是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一个内在需求。资本全球化结构依然是中国新现代性开放发展的世界历史语境。现代性的自反性在一切现代性过程中都会存在,风险社会的一切强大根据依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过程性的主要矛盾,包括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所产生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经济的现代性与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等等,都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中国用数十年时空压缩的方式高速发展,问题的尖锐度和积累度也被同步提高。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一旦拒绝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老路,必然带来转型门槛和成本升高、转型负担变重的问题。强调创新发展,必然要抛弃西方的低成本扩张模式。坚持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观,实现共享发展,必然要强调效率服从公平。扩大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必然要从单纯的“请进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转变为“内外一体”及引领经济全球化,必然越来越可能受全球“黑天鹅”风险影响,可能与老牌世界霸权势力发生尖锐冲突。我们面对的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以及高质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等等问题,都是目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新现代性的新型工业化内部,有信息化、智能化与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新型城镇化涉及大中小城市之间矛盾、原住民与新移民的矛盾、产业选择与城市布局的矛盾、城市扩张与生态资源的矛盾、人口过度集中与空间均衡之间的矛盾等;新型市场化的内部,存在市场、政府与社会的矛盾,产业转型与技术创新的矛盾,新型民主化内部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矛盾;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矛盾等,也都存在着。这些都是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必须攻克的难题。对待这些矛盾,中国化唯物史观需要确立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要承认矛盾发生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不能盲目乐观;二是要有攻坚克难的自信,解决矛盾就是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的发展形式。

第五,深刻阐明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对于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走现代化道路具有的重大借鉴意义以及开创人类新文明道路的世界意义。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发展问题,但是它对资本逻辑创制的经典现代性、苏联经典现代性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近代史上经典现代性道路等的超越,使它具有创新性和典范性。它所展开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民主化等纲领,将引领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开创一条人类新文明道路的方案,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对于这一意义的阐释,正是走向世界的中国化唯物史观的重大使命。

[责任编辑:洪 峰]